

唐
弢等撰

迟到的怀念与思考

——
关于巴人



责任编辑 铁 流
封面设计 谷济之

迟到的怀念与思考——关于巴人
唐弢等撰

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浙江省良渚印刷厂印刷
(杭州武林路125号) (杭州莫干山路良化站)

浙江省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850×1168 1/32 印张10.125 插页2 字数314 000 印数1001—1300

1990年4月第1版 1990年4月第1次印刷

ISBN 7-5339-0116-9/I·114 定 价：4.00元

目 录

1	唐 强	关于任叔
11	蒋天佐	一篇不合规格的祭文
18	浩 然	怀念巴人
28	王克平	我的爸爸巴人
42	楼适夷	一位尊敬的战友
48	谷斯范	读遗著 忆巴人
54	周而复	梦的追求
67	许 杰	怀念、回忆与崇仰
78	庄启东	人们不会忘了你的 任叔同志!
92	柯 灵	在巴人的故乡

95	丹 晨	一位马克思主义文艺 理论家的经验
100	吴中杰	论巴人的文艺思想
112	盛钟健	巴人论文学的民族 化与大众化
126	袁少杰	论巴人的人性观
142	杨 义	论王任叔在中国现代 小说史上的地位
161	钱英才	论巴人小说创作特点
178	戴光中	对于农民起义的卓异思考 ——评巴人的《莽秀才造反记》

191	骆寒超	论巴人的《烘炉》及 其在中国现代叙 事诗上的地位
209	周佩红	巴人诗歌论
228	陈福康	论巴人对中国现代杂 文运动的贡献
244	范民声	评巴人的戏剧创作
267	马蹄疾	毕生宣传和捍卫鲁 迅的王任叔

附 录

- | | | |
|-----|-----|---------|
| 277 | 王任叔 | 自传 |
| 307 | 王克平 | 王任叔著译书目 |
| 316 | 编后记 | |

关于任叔

唐 弢

我怕写回忆，因为自己的记性太坏了，没有片纸只字足资证信的材料，不愿贸然动笔。许多朋友劝我写“孤岛”时期的文学活动，迟迟未敢应命，主要也是这原因。

谷斯范同志为亡友王任叔（巴人）编辑遗文，不辞辛劳，锐意经营，书函往返，时有商榷，尤其是上海成为“孤岛”以后的事情。斯范同志和我约定，要我为他所编任叔杂文部分写篇序言；任叔的孩子克平兄又从上海来信，说他和他的母亲都望我能写一点。四十几年了，烟云过眼，稍纵即逝，有的事情捉不住，有的事情讲起来徒乱人意，思之怆然，要提笔，真不知从何说起呢。

在文艺界朋友中，我和柯灵同志合作较久，过从较多，这一点大家知道，但那是三十年代末到四十年代的事情了。在三十年代，

“左联”解散之前，经常和我联系，约我作文的是徐懋庸，“左联”解散以后，遇事一同商

量、共策进行的是王任叔。他们都给了我很大的帮助。我和任叔虽然见面稍晚，因为是同乡，很早已经听人谈起他，我从小学升入初中，和文学刚刚结下因缘，已经知道王任叔其人其事了。



任叔是在宁波地区试图建立共产党的最初动议人之一，曾在慈溪普迪小学教书。一九二四年下半年，我到邻村柏墅方培玉小学读五年级，住在校里。培玉校长江后村（五民）先生，是剡溪有名的学者，专攻经学，教员中有不少奉化人，和任叔同乡，却是新文化运动的鼓吹者，他们曾经讲过任叔和他的二哥王仲隅。从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，革命浪潮汹涌，在中等城市里，中小学教师是一股很重要的力量。我到培玉小学第二年，上海发生“五卅”惨案，消息传来，到六月初，以和丰纱厂和铁路工人为主，联合四中、四明、效实等校学生，罢工罢课，纷纷响应。不久便蔓延到乡村小镇。我们在老师带领下，组织宣讲队，贴标语，查日货，化妆演剧。半个暑假，师生们坐着一条大航船，在镇海、慈溪两县境内活动，真象是走江湖的草台班一样。我又从普迪学生那里听他们讲王任叔，少年朋友们都很怀念他。那时任叔因为与人联名在《四明日报》发表公开信，欢迎经亨颐任四中校长，驳斥遗老张让三的条陈，被普迪当局辞退，回奉化老家去了。我们没有见到他本人。

“五卅”的第二年，我离家到了上海，先是读书，后是工作，在很长时间里，象一段木桩似的毫无作为地被钉在这块土地上。任叔却在奉化成立剡社、举办《新奉化》、创设奉化中学，到广州担任北伐军总司令部秘书处秘书，“四·一二”后在宁波被捕，和著名共产党人王鲲、杨眉山（两人

就在这次牺牲)、国民党左派庄禹梅一同关在狱中，保释后转到上海，他支持白露社（原名进社文艺研究会），与李勾之合编《山雨》半月刊，往日本住了一年，而后回到上海、南京工作。这些经历，大大地开拓了任叔的政治视野，为他后来的写作（包括杂文写作）生活提供材料，打下了扎扎实实的基础。

和过去一样，我当时仍然不认识王任叔，却知道他曾和庄禹梅、杨眉山等一同关在狱中。告诉我这个消息的是我的父亲。我的父亲不识字，却很佩服庄禹梅（继良）的为人，常常“继良先生长，继良先生短”的谈到他，认为他是一个有学问的人，有了学问就不受人欺侮。他不顾人家嘲笑和讥刺，借债典屋地让我上学，勉励我要以庄禹梅为榜样，好好读书。父亲只知道继良先生是一个硬汉，却不知道什么国民党左派或右派。我呢，那时读过以“蛟川庄病骸”署名的武侠小说，以为写侠客的人一定自己也是侠客，毫不怀疑父亲的评价。有一回，父亲从家乡来到上海，带着吃惊的口吻秘密告诉我：继良先生和三个共产党员被关到宁波监狱里，其中一个姓王，据说和培玉的教员很熟识。

那时我虽然仍在念书，和社会接触不多，却明白这是怎么回事，含糊地应付过去了。

我和任叔见面来往，大概是一九三五年他重回上海以后，他住在虹口唐山路，经常为《自由谈》写稿，其时张梓生接替了黎烈文，实际负责人已经是吴景崧（向隅）。《自由谈》有个较大的变化。黎烈文重视社会杂感，别的稿子一多，副刊尾巴上便要挂出“编辑室”的牌子来，吁请作者投寄杂文和随笔。这时却已为文艺短论所替代。好在任叔什么

都来得，《作品中底心理描写》啦，《典型底写出》啦，《自然描写》啦，这些正是他后来撰写上下册《文学读本》——以及终于修改成为《文学论稿》的思想的碎金。文章固然采用随笔式短小形式，谈的却是正面的文艺创作问题，在内容上，有点近于“论”而不是“感”了。

任叔大量撰写通常所说的杂文，是在上海成为“孤岛”以后。一九三八年一月，挂外商牌子的《译报》和《文汇报》出版，他自己去编了《译报》副刊《燭火》，又为柯灵同志编辑的《文汇报》副刊《世纪风》写稿。虽然在这之前，任叔也曾为《立报》副刊《言林》、《大美晨报》副刊《早茶》写过短文，但那和他后来为《大家谈》所作的文章一样，近于短评，比较通俗。《世纪风》上的杂文却是当时引起论争的重要中心。这个副刊创刊以后，经常在上面撰写杂感的，除编者本人柯灵（陈浮）外，有王任叔（屈轶）、周木斋（辨微）、周黎庵（吉力）、金性尧（文载道）、孔另境（东方曦）、孙大可（石灵）和我；到了后期，我还介绍一同从事邮工运动的陆象贤（列车）、蒋炳勋（江渐离）参加。轮番执笔，呼应变化。任叔的特点是视野开广，思想明快，下笔迅速，跌宕有致。在几个刊物上同时写稿，应付裕如。到一九三八年下半年，在柯灵同志建议下，点了六个人的名，每人选三万字，决定出一合集。公推任叔取个书名，写篇序言，这不仅因为他写得快，也由于几个人中，他最年长，大家公认他是我们中间的“老大哥”，责无旁贷。同年十一月，作为“文汇报文艺丛刊第一种”，一册不算太薄的《边鼓集》开始问世，而且很快宣告卖完。《弁言》里有一段话说得很好：“我们是六个人，我们有各自不同的生活的

方式，有各自思索的天地，……然而八一三的炮声，把我们的心脏全部都震动得抖起来了。不，是全民族的心脏抖起来了。愤怒的抖，力的抖，正义与人道的抖——直到十一月十二日，国军退出了上海，我们的心脏就抖成了一个。我们从各个的角落里流了出来，仿佛碎散的水银，融成了沉重的一块。我们联合在一起，我们结集在一条战线上了。”

我虽然很早知道任叔，对他怀有好感，但因生性孤僻，不喜串门，他全家迁到上海以后，依旧比较疏远。后来情形变了。有一阵我因悼亡，又连续死了两个孩子，生活困难，情绪恶劣，三五个朋友时来探视，最频仍的是景宋先生，其次便是任叔。后来我读他的文章，说到“隐蔽着自己的痛楚，却去解慰别人的‘同病’”^①，才知道这时他也死了一个孩子，却从未在我面前透露。不过我现在想说的却不是这个，而是工作上的联系。在复社版《鲁迅全集》编辑过程中，他协助景宋先生主持工作，全面安排，出力最多，我参加校对，几乎和他天天见面，我们终于在三个月内，将二十巨册、六百万言的《鲁迅全集》完成了。他还继胡愈之、陈望道、郑振铎等主持社会科学讲习所，举办文学讲座，约我主讲杂文，我尽一切力量讲好这节课。社会科学讲习所适应青年的求知欲，培养了他们的革命精神，在青年中，它的声望甚至超过一些历史悠久的讲习所，可惜迫于环境，不久停办，象许多美好的事物一样，这个学校已经永远铭刻在“孤岛”青年的记忆中。从那时开始，我和任叔的关系密切起来，他常来找我，我也常去找他，包括五六个乃至十几个人的小会，有时在他家里开，有时在静安寺路（现在的南京西

^① 巴人：《生活、思索与学习·后记》，上海高山书店1940年版。

路)东头张逸侯(满涛)家里开。逸侯的伯祖是民国初年曾任机要局长、教育总长、袁世凯死后担任总统府秘书长的吴县张仲仁(一磨),在社会上享有声誉,那时又和曾任内阁总理的云南李根源(印泉),联名发起组织“老子军”,在报上发表了《老子军规划草案》^①,引起了社会普遍的尊敬。由于他的地位,也由于人们想不到一批青年人竟借“老子军”家里开会,因此比较安全。在任叔西湖坊家里开会可就不同了。集会以前得在窗台上放个肥皂盒之类作暗号,风声紧张的时候,连开会也采用打麻将的形式,而且这只限于四、五个人,再多了可不行。

现在我还留下印象的有两次。

一次是女作家武桂芳(木圭)要求去新四军,准备同去的七、八人,而那边急需一个写作能力较强的青年。派来接应的是我小学时代的同学。和我极熟。武桂芳同志因为家庭反对,临时走不成。任叔约我去商量。他看一切都容易,主张照旧走,派人做她家属的工作;我说最好冷一冷,等一等,先不要勉强,关键毕竟在本人。参加谈话的人不多,也就是三个吧,我的同学不在场,记不清另一位是谁,我们谈得很平静,并无争论。不知道什么缘故,在我的记忆里,这一次的气氛似乎很紧张。

另一次是关于《鲁迅风》的事情,人数多一些。《鲁迅风》由周刊改为半月刊,也即第十四期出版之前,已经讨论过要不要换个编辑的问题,我和柯灵都反对。这回旧事重提。任叔对编者事前并未商量,发表陶亢德《关于“无关抗战的文字”》一文,深表不满,还列举各期上某些文章,说明

^① 收入《心太平室集》卷一,1947年9月印行。

不合同人刊物创办当初的宗旨。他认为当前存在一种倾向，譬如徐訏那首题作《私事》的诗，说“葫芦里没有药”、“流行文章里争的都是私事”，也是对抗战中进步文艺阵营的污蔑，《世纪风》不该刊登。在讨论中，石灵指出《鲁迅风》编者将自己的字充当封面刊头，跳脚舞手，不伦不类，也没有经过商量和研究。大概还有一些别的议论，此刻记不起来了。尽管这次气氛并不紧张，但从谈话中感觉得到，我是被看成有偏向的人，很难启齿，因此决定只是听，不说话。

这两次会面给我的印象很深。事后，我写了一封信给任叔，坦率地说出自己对他的意见。我说他热情，勇猛，有时却过于自信，由于事情未必按照他所想象的发展，结果往往不免失算。我们这些廖化——这是三青团报纸《中美日报》加给任叔和我们几个经常写写杂文的人的“雅号”——大概不会有资格升作大将关云长，做个合格的先锋了吧，而且，即使变成关云长，不是也有“关云长大意失荆州”这句话吗？我的意思无非希望他改变一下仓猝决定、率尔应战的我所见的毛病。感谢任叔的好意，他写了一封长信给我，表示接受这个意见，并对周围的情形有所说明，又满怀热情地指出存在于我身上的一些缺点和弱点，老朋友的话，诚恳，切实，句句打中要害。这封信很长，大约有六千字左右，我一直当作座右铭那样保存着，直到一九六七年，才和其他的书信一起，一把火烧成灰烬了。

任叔一生胸怀坦荡，嫉恶如仇，确实是商量袭击敌人的好伙伴；虽然有时带点主观，对问题考虑得不够全面，但恰如鲁迅所说，“进之际，心口并不相应，或者暗暗的给你

一刀，他是决不会的”^①。“君子之过也，如日月之食焉。”^②大概这话也适用于王任叔。因此我还想对当时关于“鲁迅风”杂文的论争说几句话。近来读到一些文章和材料，把挑起这次内部论争的责任完全推在任叔身上，我以为是不公平的，也是不符合事实的。根本原因，确如任叔自己所说，在于他对潘公弼那篇社论的不满，^③杂文问题只是表面现象而已。记得《边鼓集》尚未出版，《世纪风》已经经常刊登讽刺顽固派和打击汉奸的杂文（其实《边鼓集》的杂文大部分来自《世纪风》），招惹了三青团《中美日报》和汉奸《新申报》的忌恨，他们扬言蜀中无大将，留在上海的廖化们只会模仿鲁迅，写些迂回曲折毫无价值的杂文，并将周木斋的文章截头去足，撕裂凑合，当作不通的例子公开“示众”。不知道是适逢其会呢还是会逢其适，十月十九日，阿英同志用“鹰隼”笔名，在他刚刚接编的《译报》副刊《大家谈》上，发表一篇题为《守成和发展》的纪念文章，主张“超越鲁迅”，王任叔也在他刚刚接编的《申报》副刊《自由谈》上，写了一篇纪念文章，题目就叫《超越鲁迅》。所不同者，任叔赞成多登些鲁迅式的杂感文字；而阿英主张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时代，不再需要“鲁迅风”杂文了：要战斗的，不要讽刺；要明快而直接的，不要迂回而曲折的；要深入而浅出的，不要隐约而晦涩的；要创造，不要模仿。笔锋所至，终于批评到了任叔已经发表的《边鼓集》的《弁言》，没有点名，只用“有人”两个字来代替。

① 鲁迅：《且介亭杂文·忆刘半农君》。

② 《论语·子张》。

③ 巴人：《遵命集·“鲁迅风”话旧》，北京出版社1957年版。

第二天，任叔写了篇《“有人”在这里！》作为答复，问题本来已经解决了。不料《中美日报》和《新申报》乘间起哄，进步营垒也有人施放冷枪，论争便扩大开来。《申报》当局怕事，讽示任叔辞职，任叔呢，他说：“我偏不自动辞职。让他开除我好了！”^①我当时听他亲口说了这话，后来他又写入文章。语言是能传达人的性格的，这确是任叔的话，一句传达他性格上全部优点和缺点的十分典型的话。至于杂文，事实终于证明：不仅“孤岛”上海需要杂文，便是大后方重庆、昆明、桂林也需要杂文，不是直接明快的杂文（因为那不可能发表），而是迂回曲折的杂文，隐约晦涩的杂文，一句话，“鲁迅风”的杂文。

约定要为任叔杂文写点序言之类的东西，却罗罗苏苏说了许多和杂文无关的已经过去了的事情。中途曾经想过一想，要不要改弦易辙，收转笔头，谈一谈他的杂文呢？当时决定是不改，继续写下去，因为任叔在文章里多次谈到一个信念：无以为人，何以为文，认为做人比做文更重要。那么，写到了他的为人，多少可以有助于理解他的为文吧。任叔还说：“我常常想：无以为人，何以为文。杂文尤其如此。杂文的作者必须是个坚强的战士。战士勇于杀敌，但也敢于挖掉自己身上的疮毒，然后更显出战士的光辉。杂文的存废，不在于杂文的体裁、风格与笔调，如果，这世上不缺乏战士，则总会随兴所至，拿起这杂文的武器来。”^②可惜他在印尼那段生活我一无所知，写不出来，而全国解放以后，我和任叔各忙各的，相见时少，对他的生活反而显得隔膜，

①② 巴人：《遵命集·“鲁迅风”话旧》，北京出版社1957年版。

不很了然。但是，既然说无以为人，何以为文，反过来，那该是文如其人——读其文，多少可以想见其为人吧。这样，一部《点滴集》，对我来说，恰如坐对故人，听他娓娓而谈，讲的正好是以后那段思想和生活，更多了一层亲切的感觉。

事实也确乎是这样。读《“敲草榔头”之类》、《关于“氏族社会”》、《“多”和“拖”》，恰如《遵命集》里《况钟的笔》、《上得下不得》一样，使我感到任叔思想的犀利，敏锐，精到轩豁，动人心弦，对世情的了解丝丝入扣，找不出过去那种粗疏片面的地方。而《论人情》、《真的人的世界》、《略谈要爱人》、《以简代文》诸篇，道人之所未道，出色地反映了一个作家思想的深化与成熟，他早已不是当年故乡人们口头上传说的王任叔，也不是在“孤岛”上海地下活动时的王任叔，我看到了另一个王任叔：满头白发，垂垂老去，却依旧保持着自己的童真。眼前这些文字，使我摸一颗赤子之心，一颗和生前的生活血肉相连的更为淳朴的赤子之心。哪里是人类从“自我异化”转到“自我归化”的道路呢？立足人间，探首宇外，任叔正在思索着，深深地思索着。

可悲的是人们并不了解他。象一切善良的人一样，在“史无前例”的日子里，他受到难以忍受的折磨。据说，在奉化乡间，他亲手将稻草搓成绳子，试图把自己捆缚起来，嘴里叫着：“你往哪里跑！你往哪里跑！①”任叔的精神分裂了。

他终于成为历史的悲剧里一个令人叹息的角色！

一九八一年五月五日

① 这是当时的传闻。据任叔的孩子克平兄写信告诉我：经他调查，没有搓草绳的事，他父亲精神分裂后，冷天不穿衣服，往外边跑，有一次，甚至在雪地里躺了一夜。临死时，嘴里口口声声叫着他心爱的女儿（克平的妹妹）的名字。

一篇不合规格的祭文

蒋天佐

王任叔（巴人）同志含恨死去已经十年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，他的冤案得到了平反，文艺界为他开了隆重的追悼会；近年来，他的遗著正在陆续重印或新出；他的孩子也已长大自立，并能不负先父于地下，除努力本职工作外，又积极配合谷斯范同志搜集整理他已发表和未发表的多种文稿，已见成绩。任叔地下有知，应能感到党的温暖而含笑于九泉了！而且我深信，特别将使任叔破涕为笑由衷欣慰的，是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，在全民族所依靠的顶天柱党中央指引下，已经拨正了祖国航船的方向，正在惊涛骇浪中胜利地奋进！这不正是他在悲痛中离世时的最高遗愿吗？

任叔同志比我年长，他是二十年代早期的革命风云中成长起来的一位斗士，不仅是我的前辈，而且无论在革命实践和文艺工作方面，在生活体验和书本知识方面都比我强得多，高得多。我是迟至一九三六年才认识他的。当他